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〇八期 ——  
(二〇〇九年七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907a)

---

【研究报告】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	武丽丽·赵鼎新
【当事者言】	一场荒诞的牢狱之灾	阎长贵
【文革一页】	见证历史沧桑的重庆交电大楼	何 蜀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研究报告】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

• 武丽丽·赵鼎新 •

对于文革的发生和发展的解释，很难忽略毛泽东的独特作用〔1〕。文革是由毛一手发动的，只有毛才有能力打破各级党委的控制，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也只有毛才有能力在文革的各个关键时刻不断改变其航向，驾驶着中国这一左冲右撞的巨轮，直至其去世。毛虽然有能力发动文革及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其动态，但是他却没能使文革向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文革中各级党委被打倒，但是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更为廉洁的政权；被发动起来的百姓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但是大多数人却把这种自由用于整人和派性斗争。在毛去世时，中西方所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都完全被边缘化，置对方于死地的恶性权力斗争成了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国人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十年文革的确是一场浩劫。

本文从1966至1968这三个关键年份银川地区的文革入手，试图阐明以下问题：为甚么以毛的能力和威望，他只能发动而不能控制文革？文革发展形态的内在逻辑是甚么？为甚么文革必然会把中国迅速地引向灾难？宁夏地处西北且不属于一个重要省份，人们可能因此会对银川文革的典型性问题提出质疑。事实上，从本文的讨论中可看出，银川文革与其它地区相比，有着十分相似的问题和发展阶段。此外，中共对银川文革的表态较一些重要省份来说有着一定的滞后，这就给了银川的地方官僚势力和群众组织更多的活动空间。本文将从毛泽东的克

里斯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地方官僚和群众组织这三者的关系入手来解答以上的问题。银川地区的文革对以上问题来说是一个合格的素材。

## 一. 分析框架

韦伯提出的克里斯玛权威和例行化(routinization)是本文的两个核心概念(2),有必要作简要说明。克里斯玛权威指的是建立在个人超常质量和其所体现的特定使命信仰基础上的权威。韦伯认为,克里斯玛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科层权威(bureaucratic authority)或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取代,这就是例行化或制度化。在韦伯看来,克里斯玛权威和任何例行化权威,特别是科层权威,是根本对立的。这是因为克里斯玛本质上是一种反日常结构和日常工具理性的力量,而后两者则是科层权威的特征。韦伯的论点是建立在理想概念(ideal-type)基础上的,而现实政治的权威基础往往是混合型的。毛时代中国政府是由克里斯玛型领导(毛)和其控制下的科层机器(各级党政军机关)组成。毛的克里斯玛权威及其意识形态构成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科层体制则是毛统治社会的必要工具,而这科层体制的权威来自毛的克里斯玛权威的例行化。

克里斯玛是个人性权威,而科层是制度性权威。科层运作需要规范和程序。这种对于可控性的追求势必使科层运作变得制度化、例行化和趋于保守,与克里斯玛型领导的激进性形成紧张,并会在无形中削弱克里斯玛权威。历史上,克里斯玛型领导一般都会在其有生之年对科层权威采取限制措施,以维护自身的领导(3),但是他们并不试图彻底改变克里斯玛的例行化倾向,因此克里斯玛型领导和科层之间尚能共处。但是毛泽东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文革前,毛与科层之间的各种冲突,比如毛偏好命令型经济(克里斯玛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运用)而科层追求理性计划经济,最后往往以毛在实践上的失败而告终;毛同时也对中国革命在科层领导下的迅速例行化十分不满。这就造成了毛的个人权力失落感和对其所依赖的科层的革命性产生了怀疑。从本文的视角来看,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想藉“继续革命”的方式来克服科层的例行化,从而保持他的克里斯玛权威及其意识形态的革命性。

科层体制的权威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化身毛泽东本人。因此面对文革的冲击,中共的巨大科层显得非常无力。正如文革前毛与刘少奇在一次争执中所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但是,毛发动文革却遇到了如下的困境:第一,文革的斗争对象是科层体制,因此毛不可能依赖科层来进行这一场革命。他必须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但是,群众不可能是毛的意志的化身。他们有着在文革前与地方科层的恩恩怨怨,有着对文革的不同理解和对毛的不同忠心程度,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欲。因此,群众在文革中的行为与毛的希望大相径庭。毛很快便意识到,由于群众的利益和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群众运动的反例行化特性,群众组织要比科层更难驾驭。第二,虽然文革的对象是中共科层,但毛并不认为他参与创建和正在领导的党已经是漆黑一片。文革的目标是“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难题:到底谁是走资派?除了早就想除掉的刘少奇外,毛对于这一问题并不清楚。这就有了如下后果:科层中不同派系把对方视作走资派抛了出去;群众把自己憎恶的干部标记为走资派;群众组织头目和某些科层干部相互勾结,以打倒另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国于是成了一个霍布斯的世界,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自由的人们,在人人自危的状态下卷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第三,中共的科层负有保卫和管理这一国家并为大众提供基本服务的责任。除非毛真的想“再次上山去打游击”,否则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他也希望国家的一些基本事务能得到处理,而这一愿望必须通过科层得到实现。这就是说,即使是在各级科层受造反群众冲击最为凶猛的时候,毛仍然需要依赖科层来管理这一国家。毛能把科层中的任何人打成反革命,但是却不能把整个科层一锅端。中共科层的国家机器功能给了科层一定的自主性。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毛中央的信息不灵和顾不过来,更由于毛有着种种投鼠忌器式的

顾忌，各级文官和军事科层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混乱的派性斗争中，把文革的发展方向进行对自己有利的、有限的制度化或例行化。

毛的克里斯玛权威和以上的三个结构因素的耦合决定了文革的发生和发展：科层无法阻止毛发动文革，但是造反群众和各级科层却能在文革中把毛及其思想转化为合法性符号并对其进行挪用。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使文革有了独立于毛的意志之外的发展逻辑。毛可以在任何时候利用他的克里斯玛权威发出指示以改变文革方向，但是毛却无法阻止自己的话语被各种力量利用，将文革导向毛所不愿见的方向。于是，当毛觉得社会太混乱而发出向“右”转的指示时，科层势力抬头，造反派受压，社会走向保守的例行化方向；而当毛发出向“左”转的指示后，反例行化的造反组织就会抬头，科层势力受限，社会则走向混乱。文革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左右摇摆中变得日益不可驾驭。在银川地区，这种混乱的加剧，迫使毛在1967年不得不用他最后所能依赖的野战军军事科层来整合局面。但是，野战军一经起用后，其运作逻辑与传统科层相差无几：造反派受压、科层权威重新确立、一个新的例行化过程启动，毛最终败于一个被文革大大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沉重、派性斗争不断的科层权威手上。可以说，韦伯打败了毛。以下，我们将以这一理论框架为指导，对银川地区文革的兴起和发展进行描述和分析。

## 二．工作组和保守红卫兵——科层对克里斯玛动员的控制（1966．6—9）

银川地处边缘。当北京文革已发展得轰轰烈烈时，宁夏还在搞社教运动。宁夏自治区党委把文革作为社教的延续。各单位社教团直接领导文革，他们建立黑名单，把黑五类和其它有历史问题的人，划成右类并进行批斗。

北京文革的消息通过报纸和电台传到了银川。1966年6月2日，在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影响下，宁夏大学的九名学生贴出了一张“检查我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状态”的大字报（5）。该大字报的内容纯属模仿，其策划人只是学生干部和积极份子，然而这行动却震动了宁夏区党委。依据惯例，区党委向宁大派出了调查组并对学生进行严密监控。同时，宁大组织学生对大字报的作者进行了批判，把他们定性为“反党份子”（6）。

6月4日，按照当时刘少奇所发出的中央指令，区党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银川各校领导文革。工作组将运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当北京高校领导被大量打倒时，宁大领导得以暂时免于此难。6月中，毛下令全国学校停课半年闹革命，宁大学生变得更为兴奋。18日，一张批判宁大党委书记江云的大字报出现在《宁夏日报》社门口。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一方面命令工作组迅速制止这种行为，另一方面明确宣称“江云不是反党份子，宁夏大学不是北京大学”。同时，他们派江云到西北局开会以躲避冲击（7）。

宁夏文革工作组把运动的矛头指向教师和下层干部。6、7月间，以宁大为例，83%的老师和下层干部遭到了大字报的批判，42%的教师和59%的干部划为坏份子被批斗（8）。某些工作组还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银川一中高考准备班（高三班）的大部分学生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工作组把他们定为“资产阶级的小苗苗”加以批判。这种做法惹怒了班里出身红五类的干部。于是他们就在中央媒体舆论的影响下组织了“保卫校园”的反工作组行动。该行为被区党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学生们被遣送到郊区农场进行整风（9）。自反右运动后，各级党组织的权威成了神圣。它们从毛那获得了制度克里斯玛权威，因此“进攻工作组就是进攻宁夏区党委，进攻区党委就是进攻毛主席和党中央”（10）。在这一例行思想影响下，地方科层对学生造反的自然反应就是镇压。这些文革初期的牺牲品大多数都成了以后造反派的骨干。

进入7月下旬，科层权威对文革的控制遭到了毛的批判。毛反复批评了刘少奇派出工作组

是犯了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并勒令撤销工作组。此后毛试图抛弃科层中介，以个人名义直接与群众发生联系。他的眼光投向清华附中红卫兵。毛写信盛赞他们的革命性，并把他们的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材料在会上颁发。8月9日，在毛的操纵下，大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指出文革的主要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撤销工作组和通过十六条使群众感到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它的斗争对象不是群众而是党的领导阶层。8月18日，毛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了红卫兵，从此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

然而，这一切并未彻底打破各级科层对文革的控制。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取得文革领导权的是宁夏区党委一手扶植的文革筹备小组。当然，迫于形势，区党委也改变了一些策略：他们为因反工作组而受压的学生平反，并抛出了与宁夏一二把手杨静仁和马玉槐不和的几位干部作为“宁夏区党委内的黑帮黑线”进行批斗，其中包括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吴生秀，区党委常委会副主席刘震寰和文化局副局长杨辛〔11〕。

在区党委的控制下，银川成立的“红卫兵总部”只允许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参加，其头目也都是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的子女。他们热衷于“破四旧”，并对种种针对他们父辈的造反行为进行压制。十六条发布后，银川的工厂和政府机关里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反单位党委领导的行为，但是如同当时的学生造反一样，这些行动马上就被扣上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直至9月底，银川文革基本被控制在制度轨道内。

### 三．串联红卫兵和科层的失控

如果说毛与清华红卫兵的直接接触，是打破中共中央科层对文革控制的关键，那么毛发起由国家负担经费的串联，则是一个打破地方科层对文革控制的有效手段。在毛和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北京文革迅速朝毛的意图发展。但是在“天高皇帝远”的银川，地方科层却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将运动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串联开始后，北京的造反信息迅速扩展。北京红卫兵因其政治优越感，加上与地方上的权威没有任何关系，行为极为大胆：他们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地方的最高权威，帮助或直接组织了原本力量很薄弱的地方造反派，并为地方造反派提供了行为模式。

最早到达银川的是蒯大富手下两个出生于宁夏的清华学生。他们到达银川后立即试图在自己的母校建立造反组织〔12〕。8月下旬，一批来自北京第三十和五十五中学的红卫兵到达银川〔13〕。他们一进银川就把攻击宁夏区党委的大字报贴到区党委门前，并要求杨静仁出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是“毛派来的革命小将”，杨静仁只得亲自出来欢迎，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了谨慎的回答。北京红卫兵的行为在银川造成了极大的震动：银川极少数造反者的眼光还仅仅局限于本单位的领导，北京红卫兵的行为使他们意识到连区党委都是可以挑战的。第二天，在北京红卫兵的指引下，本地学生开始在区党委门前贴出大字报，如“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要挖出彭真埋在宁夏的定时炸弹”、“杨静仁已经对北京红卫兵表示了支持”等等〔14〕。

大学红卫兵在政治上比中学生敏锐。通过北京红卫兵，宁夏的大学生当中有人看出了文革动向与宁夏党委的领导方向是相反的。在中共罢黜了宁大党委书记江云后，宁大的激进学生在9月2日召开了批江大会，并把斗争矛头直指宁夏区党委。在会上，学生指责江云的检查是区党委给准备的，他们要哈炯磊（宁大工作组组长）和王钊（江的秘书）来对证。区党委拒不给理，并否认曾包庇过江云。激进学生于是聚集区党委前，提出“区党委拒不交人是为了掩藏江和区党委之间的阴谋”〔15〕。“九二行动”是宁夏学生对区党委的第一次直接挑战，它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反响。此后，宁大学生产生了对立的两派，但保守派占有绝对主导。

面对日益激进的学生，宁夏地方科层采取了进攻措施。9月12日，自治区副主席陈养山

作报告称,“宁夏的工作组并没有犯路线错误,只是犯了方法错误;杨静仁领导的区党委在执行文革中采取了正确的道路”。此后,银川大街上贴满了攻击宁大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批判区党委的大字报几乎消失。对此,银川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策划了更为激烈的行动。9月21日宁大激进学生组成的革命串联队贴出大字报,号召在25日召开“揭露宁夏区党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会。二十多个单位的造反者对通知做出了响应,并一起组织了大会筹委会。大会在区党委的阻挠下如期举行。马玉槐、杨一木和陈养山被点名批判。会上同时也出现了如“杨静仁是宁夏牛鬼蛇神的大红伞”、“宁夏区党委是黑线黑帮”、“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口号〔17〕。

“九二五大会”时,由北京红卫兵鼓动扶植起来的银川造反派在数量和势力上都还很有限,他们在银川处处受压,而且北京红卫兵还被驱赶,但是宁夏科层的权威已大大受损。9月底,大量宁夏学生冲破区党委的控制去北京串联。在北京红卫兵的保护下,宁大串联队的领导最后也得以进京串联。随着文革在10月份激进转向,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壮大。

#### 四. 造反派兴起和文官科层的瓦解〔1966.10—12〕

北京红卫兵在地方受到攻击和地方造反派受压的情形通过串联红卫兵传到中央。自9月中旬起,毛开始对在科层控制下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产生了不满,并酝酿着运动的转向。10月1日,林彪在国庆讲话中指出文革进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而资反路线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群众造反进行压制。而后,毛召集地方领导参加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对他们处理文革的方式进行了批评。“批资反线”和10月工作会议打破了各级地方党委在百姓中的神圣地位。在制度克里斯玛权威被毛剥夺后,各级文官科层走向瓦解,受压的造反派红卫兵则迅速崛起。

银川的发展依旧比北京滞后。直到10月中旬,宁夏区党委仍在组织干部和保守群众对宁大的造反学生和“九二五大会”进行攻击〔18〕。但随着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毛的态度日益明确,这些攻击迅速消失。同时,宁大造反派红卫兵正式退出“红卫兵总部”,并组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该组织成员标准宽泛,大量被老红卫兵排除在外的学生加入了这个新组织。通过串联,银川学生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正如一名红卫兵所讲,“串联彻底解放了我的思想。看到北京那么多高层干部被批斗,我感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遍地都是。批斗地方党委干部是绝不会犯错误的。”〔19〕

进入10月下旬,区市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在银川形成。10月底,宁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了一个“联合总部”,以协调宁大的各派造反组织。不久,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成立了自己的区市级组织。宁大联合总部开始向党政机关和厂矿派出串联队发动造反。造反派在各单位内大都是受压的少数派,他们因此也会主动寻求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银川文革因此从单位转向区市层面。11月,银川形成了以行业系统为基础的区市级造反组织。

工人造反派的出现是当时的焦点。厂矿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放开对工人的限制,将会直接威胁到经济生产和国计民生。早在9月份,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不允许工人成立自发组织和发动串联,工人造反组织因此有着合法性的问题。11月下旬,银川的一些工人组织要求区党委批准其成立区市级组织并供应相应物资,区党委则以中央九月文件的名义予以拒绝。但进入12月,随着运动的发展,毛认为工人参加造反是文革的必然,中共中央在12月9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批准工人在文革中自由成立组织和进行串联。此后,银川的工人造反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20〕。鉴于造反力量的迅速发展,各单位的保守派群众也在干部的操纵下成立了“捍卫毛主席联络站”这样的联合组织,与造反派对抗。至12月中旬,银川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

与其它省市相似，银川的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成员构成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保守派有“五多”：红五类多，党员多，团员多，干部多，积极份子多。他们是文革前秩序的受益者。造反派中则包括了从红五类到黑五类的各种人，其中有不少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各单位的受害者或受牵连者，特别是在宁夏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中和文革初期的受害者（21）。造反派因为在本单位内处于劣势而走向社会，但是一旦走向社会，其诉求便超出了单位内恩恩怨怨的限定，形成了超单位的诉求。但社会上的造反派并没有真正的统一，他们有的只是在受当权者压制时暂时联合，一旦外部压力消失，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纷争就会爆发。与造反派比起来，保守派的组织性和内部统一性要大得多，他们在人数上也要比造反派占优势。只是因为当时毛的政策偏向造反派，保守派才会在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占下风。

面对造反风潮，宁夏领导只有招架之功。12月11日，杨静仁被迫承认区党委在工作组问题、对待群众组织问题和串联问题上犯了错误（22）。15日至16日，宁大红卫兵要求杨静仁罢马玉槐的官，杨含糊其词。造反派学生决定将宁夏区党委的领导拉到北京评判。16日下午，宁大红卫兵卧轨拦车将马玉槐带到北京。中央责成杨静仁和区党委副书记甘春雷赴京处理马的问题。在北京，当中央表示明确支持造反派学生后，甘转而支持学生，并对杨进行了揭发。1967年1月12日，宁夏造反派召开了批判杨、马的大会。15日，杨、马从北京被带回接受群众批判。杨刚下火车就被带上牌子游街（23）。18日，陈毅接见宁大毛主席思想红卫兵，明确提出杨、马应被打倒。宁夏文官科层遂彻底陷入瘫痪。

在中央明确表态打倒杨、马后，保守派群众意识到自己“站错了队”。他们或重新改组，或改变组织名称以适应新形势。有些保守派组织甚至与造反派比激进，他们在喊打倒杨、马的同时还加入了区党委中许多其它干部。这种行为体现了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盲从性和投机性。保守派群众打出了造反旗号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限变得模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组织联合起来反对共同对手是常见现象。

## 五. 一月夺权——文革制度化的失败

区党委被打倒后，银川陷入了全面的混乱。生产停滞，经济主义风潮蔓延，同时在双反运动中受害的干部和群众要求平反的呼声日益增高。银川出现的这种现象并不独特。1966年底，全国各地因为地方党委的瘫痪或半瘫痪都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成了毛在1967年伊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正值此时，上海发生了造反派夺权事件。毛决定对上海夺权表示支持，并号召全国的造反派都起来夺权。毛的用意十分明显，他想用造反组织来替代科层，从而将文革这一反例行化的革命状态制度化。在中央宣传机器的狂热煽动下，全国上下都陷入了夺权的疯狂中。

《宁夏日报》社造反派因其信息灵敏，早在1月13日就得知上海的夺权消息，他们随即在本单位进行夺权。夺权风潮在银川迅速扩散。在许多单位，夺权就是抢夺各单位公章和办公室，许多人为抢公章大打出手。在各单位相继夺权的同时，宁夏区党委的夺权也被提到日程。区党委的夺权是由甘春雷、区党委造反派，和社会上的主要造反派领导协调完成的。1月中，甘让区党委造反派领导与社会上的造反派联系商讨区党委夺权事宜。1月17日，银川十三个造反派组织开会讨论夺权问题。会上造反派内部出现了分裂。首先是以北京为首的外地红卫兵和宁大红卫兵的矛盾，矛盾源于对权力分配的不满和思想认识的不同。北京三司驻宁联络站强调宁夏夺权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宁夏文革还需要大混乱大动荡。在北京红卫兵的煽动下，中学生红卫兵从大会退出。虽然如此，十三个组织中的大多数同意联合夺权。1月18日至25日，这些造反组织成立了“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起草了夺权公告，选举了七名常任委员，并决定建立文革和生产建设两个办公室。1月20日，主要造反派领导去宁夏

军区寻求支持（此时毛已命令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所以军队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宁夏军区派出副司令员张怀礼参加造反派夺权（24）。

在造反派准备夺权的同时，打出造反旗号的原保守派群众也在加紧准备夺权。迫于形势，造反派只能在1月27日匆忙提前夺权。在军区派出的士兵和宁大红卫兵的保卫下，造反派夺了杨、马的印章。夺权后，联委会立刻进行游行示威庆祝夺权胜利。仓促夺权并没有结束银川的混乱局面，相反它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首先是内部分歧。夺权后，为建立革委会，联委会准备为在1960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害的干部平反，并吸收他们加入新的权力机构（他们一直暗地支持着本单位的造反派）。但是这些干部因受迫害的程度不同而对平反方式产生了不同要求，这些问题与群众组织之间对革委会的权力分配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联委会的分裂。一些造反派退出联委会，成立两个新组织：宁夏总司和三司。这两个组织的力量与联委会比起来人少势弱，但是他们却削弱了联委会的力量（25）。与此同时，原保守派组织和夺权前退出联委会的以北京红卫兵为首的造反派组织组成了反联委会联盟。联委会在反对力量的夹击下根本无法行使其权力。银川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特殊，毛并没有给出一套具体的指示来指导夺权，再说，在争权夺利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即使是毛有指示，也不见得会有效。这就使得夺权在大多数省份完全成了一场场无序的争夺。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夺权后许多省份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造反群众开始冲击各省军区。这背后有两个原因。首先，随着运动的激化，军事科层作为未被触动的科层力量必然会成为攻击对象。更重要的是，由于造反派中很多人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夺权后造反派马上要求销毁地方权威整理的关于他们的“黑材料”。但是，许多地方党委在这时已把那些重要档案，包括“黑材料”，送到军区保存。于是一些造反群众试图冲击军区以获取这些材料。军队混乱会导致整个政权的垮台，毛对此不能容忍。这迫使毛在文革中第一次对文革的发展作出朝着缓和方向的调整。1月下旬，毛禁止了造反派对军队进行攻击，并下令军队支持左派。

## 六. 毛的困境

### （一）军事科层还是群众派性

夺权后文官科层四分五裂，文革精神推到了极端，但是社会却没有向毛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换来的是一片混乱（26）。这就迫使毛不得不下令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试图用军事科层的力量来驾驭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并于2月下旬提出革委会应采取“三结合”（军队、干部和造反派群众代表）的形式。但是，各地军事科层与文官科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事科层对造反夺权有着本能的反感。比起文官科层，军事科层更为讲究纪律和服从，因此他们在处理事务时往往更会遵守例行，压制难以驯服的造反派，使整个社会朝着反文革的方向走去。军事科层的这一倾向又使毛转而支持造反派，对军事科层施压。可是毛一旦这样做，整个文革又会朝着混乱的方向发展。在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间，毛的政策一直在保守和激进两个极端摇摆，直至对造反派力量彻底失望，下决心镇压他所一手发起的造反力量为止。

军队的介入使得军区对联委会的态度变得十分重要。但是，宁夏军区与区党委关系密切。联委会刚成立时，军区对他们的支持纯粹是迫于一时政治气候不明。1月底后全国形势往右转。在这一背景下，宁夏军区以一件很小的事件为借口对联委会施行了镇压：当时《解放日报》一名记者到银川收集当地运动的情况，该记者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他在采访过程中因一些小事与联委会下属成员发生了争执。盛怒中他来到宁夏军区声称夺权太乱不应批准（27）。军区乘机改变了对联委会的态度。2月8日，北京三司驻宁联络站从银川郊区动员了一个由杭州下乡青年组成的造反组织来砸联委会。作为回敬，联委会的造反派把三司驻宁头头

赶回了北京（28）。联委会这一行动给军事科层以镇压的借口。第二天，军区司令朱声达召开会议讨论一二七夺权是否正确。会上朱声称联委会在夺权期间对其他群众组织执行了白色恐怖和排外政策，“二八事件”充分暴露了联委会的右倾本质。2月11日，宁夏军区发表公告撤销对联委会和其夺权的支持。联委会夺权十六天后流产（29）。

随后军事科层试图将造反派从组织和舆论上彻底摧毁。2月19日，宁夏军区发表“给全省人民的一封信”，指一二七夺权是“在资产阶级当权派甘春雷指导下的右派夺权”（30）。之后，军区以银川清洁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中医院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内部有“坏份子”为借口解散了这两个组织，并且关闭了宁大红卫兵所举办的宁夏文革造反派展览并没收其材料（31），军区主持的三千会、公交会、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等都以一二七夺权为界，不准支持夺权的干部参加。同时，军区动员了保守派组织攻击联委会。夺权被标记为“甘春雷操纵下的右派夺权”，联委会则被攻击为“联委会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在军区的支持下，保守派组织联合建立了“革命大联合筹备处”（32）。

在此形势下，联委会在3月7日发表声明，要求与军区通过商讨解决分歧。朱声达显然不想妥协。作为响应，他称三七声明为“一小撮右派头头的阴谋诡计”，要求联委会“交代罪行并交出他们的头子甘春雷”。他并且动员了保守群众发动一场“抓右派头头”的运动（33）。此时，一批一直在幕后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走到了前台（大多数是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打压的干部）。他们成立了以区交通局王志强为首的“翻江倒海战斗团”，公开表示支持联委会。宁夏军区内部也出现了支持联委会的声音（如张元礼和刘德夫）。但是，造反派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处于守势，在军区的压力下，许多人退出了造反派。联委会也不得不更名为“革命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34）。

造反派的受压状态随着毛的政策在4、5月间的变动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反“二月逆流”后，毛对军事科层对造反派的镇压，多次表示了不满。4月初，中央军委下达指令，正式取消军队对文革的控制权。毛的政策变化给宁夏造反派带来生机。但是造反派的复苏并未能够击败军事科层及它支持的保守派组织。这其中四个问题。第一，军事科层和文官科层不同，军人作风强悍。他们同时掌握着军队，造反派不可能将他们随时抓来揪斗。除非是毛的亲自命令，否则他们是不会像文官那样轻易就范的。第二，军事科层是毛政权最为重要的支柱，军队乱了会导致境外敌对势力的入侵，军人急了会有兵变。因此毛不会像对待文官一样对待军队干部。第三，在十来个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但形成了造反组织，而且还造就了一群与军事科层有很大亲和力的、同时也声称是在进行革命的原保守派组织。有了这批人，军事科层的气要壮得多。而对毛来说，“敌我”阵线已不像文革之初那么清楚。第四，十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已把中国弄得天下大乱，各地问题不断且问题性质不同，中央疲于奔命，顾此失彼。4月间毛的言论虽然给了造反派复兴的机会，却没有对军事科层支持保守派组织给予明确否定。这样，毛在4、5月间的变化不但没有压垮各地军事科层，反而造成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各地造反派在毛的新动向鼓励下咄咄逼人，原有的保守派在地方军事科层的支持下也打着造反的旗帜，与造反派针锋相对，派性武斗在许多省份愈演愈烈。银川的文革就这样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各地军事科层对造反派的压制受到毛的批判后，朱声达则坚持中央的方向转变是中央文革的旨意，而文革小组不过是个办事机构，并无决策权力，他强调中央军委的指令给了地方军区“自卫”权力。为了对付日益活跃的造反派，朱用召开贫农会的方式动员农民加入保守派，并动员农民进城攻击造反派。他还指示筹备处到石嘴山、吴忠等地串联，与当地武装部建立联盟。为了增加其统治的合法性，朱让区党委的老干部加入军区领导的第一线生产指挥队（35）。

进入5月，造反派和保守派形成了严重对峙。5月初，被军区解散的两个造反派组织要求平反被拒，同时，造反派红卫兵在公安局前静坐和绝食，要求收回宁大的文革展览材料（36）。



朱拒绝作出让步，与造反派针锋相对。筹备处在5月底砸了新华社驻宁分社，认为它是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小组于6月5日和6日向朱发了三个指示，命令他严肃处理这个事件，朱不予理睬。同时，由朱支持的筹备处和地方武装部在吴忠和石嘴山地区发起了武斗（37）。兰州军区命令朱改变行为，6月18日中央发令禁止军区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对于这些要求，朱都以中央和上级机关不明了地方情况为由予以搪塞，充分显示了军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质。面对进攻，造反派的行为也变得更加激进。7月19日，造反派举行集会“声讨朱声达在武斗中杀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次日武汉七二零事件爆发。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曾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马思义（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被降职）在7月24日率领约四百人进攻保守派实力强大的吴忠，并占据了吴忠仪表厂（38）。

筹备处于26日成立了宁夏大联合筹备处，对外称其成员达八十万人，与总指挥部抗衡。与此同时，总指挥部准备对筹备处发起大规模的攻击。7月底，因传闻说西塔是筹备处的总部，总指挥部的两个工人头头程学儒和刘青山率人攻打西塔，行动失败，二十多名人员被俘。随后，石嘴山一千二百多名矿工和钢厂工人乘坐五十多辆卡车进入银川支持总指挥部，当天下午他们攻下西塔。筹备处五人死亡，三百多人被俘（39）。

攻下西塔后，总指挥部在银川的实力占了上风。但是，马思义在率人攻入吴忠仪表厂后被包围，吴忠造反派告急。8月8日，总指挥部人员带着长矛乘数百辆卡车往吴忠解围。行至永宁县大观桥时，车队遭到了筹备处的伏击。枪是当地武装部发的，而参与伏击的人大多是复员军人。总指挥部一百多人死在大观桥，受伤者更多。大观桥事件后，造反派开始从军区抢枪武装自己（实际上是军区内的造反派让总指挥部的人员拿枪）。银川武斗开始大规模运用热武器。

8月13日，筹备处攻下吴忠仪表厂，马思义被打死。宁夏武斗于是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为了结束武斗局面，中央判定宁夏军区犯了严重错误，朱被召到北京接受审查，第一野战军六十二师进驻宁夏。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和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被指定为新领导。8月18日，兰州军区宣布总指挥部为革命造反派（40）。形势骤变使筹备处的群众措手不及，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对野战军的进驻十分愤怒，于是就爆发了筹备处与六十二师间的冲突，并导致了青铜峡惨案。当时中央下令六十二师进攻在青铜峡守卫的筹备处武装人员，造成筹备处一百多人死亡。从此筹备处走向衰落（41）。

## （二）军事科层和造反派的消亡

总指挥部在被确认为造反派后行为变得张扬。在单位中，总指挥部的成员对筹备处成员进行报复的现象十分常见。但是当时中央的政策是各派群众大联合，总指挥部因此失去了彻底搞垮筹备处的机会。在中央的操纵下，各派组织达成了协议，于12月27日宣布成立以新的军区领导为首的文革委员会筹备小组（42）。

革筹小组成立后，韦伯的例行化机制重新启动。虽然革筹小组的领导都是冲着支持造反派而来的，但是造反派的反制度倾向决定了军事科层和总指挥部在蜜月后的必然冲突。他们的冲突起于革委会的人选问题。两个问题成为焦点：一是甘春雷是否应进入革委会（军事科层支持王志强）（43）；二是宁夏四派群众组织代表在革委会应占的比例。军事科层坚持四派席位对等，而总指挥部则认为造反派应当占多数（44）。这分歧导致了总指挥部内部的分裂。于是就出现了拥护新军事领导的“小米加步枪”（米派）和拥护甘春雷的处于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布派）。1968年2月24日，革筹小组发下了一个革委会成员暂定名单以供讨论。这名单激起了布派领导的强烈不满：名单没有布派支持的干部、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布派称“名单没有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用修正主义篡夺文革的胜利”。迫于压力，以康健民为首的革筹小组在名单中加入了布派的主要领导（45）。

然而，军方在妥协的同时，暗地动员米派指责布派攻击革筹小组。作为响应，布派在3月2日声明群众大联合和未来的革委会必须以革命左派为核心，甘的问题必须适当对待。声明发表后，布派的一个激进下属组织成立了“肃清叛特反资联络站”，专门进攻米派，布米两派之争开始深化。尽管分歧很大，但是在中央的督促下，宁夏革委会还是在4月10日宣告成立。

然而，1968年3月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影响下，毛对文革的形势再度不满。如1967年3月一样，毛感到军队对文革中混乱形势的缓和走过了头，于是发动了“反击右倾风”运动。4月12日，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反右倾风运动的执行。“反右倾风”为布派提供了良机。在会议上，布派领导批评了革筹小组的右倾保守主义。康健民不得不作出自我批评并宣布欢迎甘春雷回来。运动转向后，军方试图把斗争的矛头转移到影响力已经很小的筹备处身上，但是布派则力图打击军方领导和王志强，从而获得对革委会的控制。布米之争继续深化，武斗再度爆发。5月2日和7日，固原地区爆发了布米两个下属组织的武力冲突。同时，银川米派两千多人攻击了布派以刘青山为首的“八八交通兵团”，并发生了武斗。5月23日，刘又进攻米派作为报复〔46〕。

军区领导决定利用米派彻底搞垮布派以恢复秩序。6月1日，在纪念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二周年的大会上，康健民指出在前两个月的反右倾运动中，存在着一股极左风干扰着运动的大方向。第二天，在军区的操纵下，米派一个下属组织砸了布派控制的工人代表大会的牌子。6月9日，米派的几个下属组织发表了“六九声明”，指出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宁夏的第二套班子”。军队领导立刻表示支持，并声称要用六九声明统一宁夏的两百万人民。面对进攻，布派于6月13日发表声明称，目前运动的任务仍是“反右”：“六九声明是分裂革命阵营，颠覆红色政权”。但是，布派错估了形势。两年的文革使中国变得满目创伤，毛作为当权者的一面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了群众运动的可怕，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两年前的豪气。在银川武斗加剧的同时，全国各地在相似的背景下也再度出现混乱局面。7月间，毛不得不转而支持军方。

军方在毛转向后对布派发动了强攻。8月，军方领导的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各单位革委会里的布派领导被清洗。8月底，按照中央的指令，宁夏的四大派组织都被解散。9月9日，军方将布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47〕。此后在宁夏革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中，布派的领导都在遭到批斗后被打倒〔48〕。一场反科层的克里斯玛运动以保守的军事科层统治结束。韦伯就这样打败了毛。

注释：

〔1〕 如：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Frederick C.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ing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New York: W. E. Sharpe, 1984);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the Interpretive Sociology*, trans. Ephraim Fischhoff et al.,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111-48.

〔3〕 对这种克里斯玛形态的分析可参考 Arthur Schweitzer, *The Age of Charisma* (Chicago: Nelson-Hall, 1984)。

- (4)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页118。
- (5)，(11)，(13)，(22)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1925.8—1988.6》（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页350；351—52；355；359。
- (6) 第45号被采访人。
- (7)，(8)，(31)，(32)，(33) 宁夏地方文献馆收集：《宁夏各种小报汇编》（银川，1967）。
- (9)，(10) 第40号被采访人。
- (12) 第21号和第42号被采访人。
- (14) 第42号被采访人。
- (15)，(16)，(17)，(18) 宁夏大学联合指挥部材料组编：《革命造反有理：大字报选辑》，第一集，1967年4月，页5—7；40—48；20—30；48—54。
- (10) 第46号被采访人。
- (20) 银川工业薄弱，党政机关和文教系统的造反派因此在银川文革中始终起着领导作用。
- (21) 宁夏在1960年曾发动过如下两场地方性政治运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于1960年上半年在区党委中进行，以刘格平为首的老区党委领导班子被认为是“搞地方民族主义”被罢官或降职，由以杨静仁为首的新领导班子代替；以消除地方民族主义的社会根源为名，1960年下半年宁夏党委在社会上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坏人坏事运动”，大量群众遭到了迫害。这两场运动在干部和群众中留下的伤痕是影响宁夏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 (23) 大江东去：〈人间正道是沧桑〉，1967年4月27日，页7。收于银川工业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挥部编：《论宁夏一二七夺权：大字报汇编》，第二集，1967年7月15日；第30号和第38号被采访人。
- (24) 银川市工业系统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部编：《发扬“一二七”革命造反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字报汇编》，第一集，1967年3月，页1—4。
- (25) 他们同时反对造反派和保守派，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 (26)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472。
- (27) 第30号被采访人。
- (28) 过大江、红雨：〈不废江河万古流〉，1967年5月30日，页5—7。收于银川工业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挥部编：《论宁夏一二七夺权：大字报汇编》，第二集。
- (29)，(30)，(35)，(37)，(40)，(42) 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8年元月27日，页103—108；116—20；103—106；103—108；91—93；96。
- (34) 第29号被采访人。
- (36) 中共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银川市档案馆编：《中共银川党史大事记：1949.9—1996.1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页112。
- (38)，(39)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页29；30。
- (41) 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85—86；第18号采访人。
- (43) 甘曾积极参与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所以甘与王虽都在总指挥部内，但旧怨仍深。甘想让原区党委的一些干部进入革委会，王则大力反对。新军区领导鉴于甘与旧党委的深厚关联而偏向于王。这条信息由第30号被采访人提供。
- (44) 以下述主要是建立在宁夏革委会编辑的史料《宁夏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事件记载》（1974）和对当事人采访基础上的。

〔45〕 《宁夏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事件记载》，第一部分〈从407号文件发表到区革委会成立〉。

〔46〕 同上，第二部分〈从区革委会成立到“六九声明”发表〉。

〔47〕 同上，第三部分〈从“六九声明”到二扩会召开〉。

〔48〕 同上，第三部分〈从二扩会召开到党的九大〉。

□ 作者：武丽丽、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

# 【当事者言】

## 一场荒诞的牢狱之灾

• 阎长贵 •

### ◇ 送错一封信，成为“阶下囚”

在1967年12月底的一天，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转来的给江青的信。这封信是北京某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工作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这封信我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的话，等等。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受到的冲击。我感到这封信很难处理——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我误会了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我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我所谓“有您的名字”，并不是说信的“抬头”，这是写给江青的信，当然抬头是江青，而是信的内容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说，此人及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再说一次，这一点我是误会了——确实确实误会了，这位写信人和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什么关系。我万万没想到，由此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一下子，我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我“请示”她的那封信，我轻轻而又胆怯地说：“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过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这个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或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1967年国庆节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

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

这时我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在看守着我。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政治要犯”，这今非昔比的变化让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因为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时，也正是1月9日，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鬼使神差地让我这个“书呆子”从1967年1月9日的“座上客”，变成了1968年1月9日的“阶下囚”！

我虽然被看管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但并不知道需要反省，而开始认真地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慢而又强调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这三个人的姓氏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我第一次听到。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说：“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我怎么是他们安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心想，江青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连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打倒了，这不是自折“股肱”！我当时实实在在把他们看作都属于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我感到我的思想跟不上江青他们，心绪很乱。稍微冷静后，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尽管尽心尽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做起检查。又过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了，他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了。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这么一种阵势，对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了。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我兀地感到泰山压顶、五雷轰顶，我这样一个仅仅二十二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负责人？一下子脑袋胀得很大，嗡嗡作响……谢富治装成红脸，面对着我：“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模模糊糊觉得他是劝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于是我连忙点头，说：“是啊，我有什么就谈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着他的口授给我爱人写一封信……就在这四位“大人物”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中去了。

#### ◇ 秦城八年，寂寞难耐

1968年1月24日深夜，我由荷枪实弹的两名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驶离了钓鱼台——这个留下我特殊记忆的地方，在凛冽的寒风中驶向一条通往北京北郊的公路。那里有一座黑森森的监狱——秦城！从此，我就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亦即最能创造业绩的七年多时光。

后来知道，1月24日深夜，就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秉承江青旨意将我押往秦城的时候，陈伯达等还布置了一次小规模“抄家”活动，到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翻箱倒柜，搜身检查，等等——实际上，他们一无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得。当时我爱人和儿子，刚从山东农村来

北京不久，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战士的家属探亲宿舍。陈伯达为了让此次“抄家”能有所获，利用他逼迫我给妻子写的那封信——如前所说，内容是陈伯达口授的：“××：我因公出差，我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来人前去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云云。很可能也是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的安排下，在抄了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之后，警卫部队又把他们连夜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的招待所软禁起来。5月，即麦收前，面对我妻子再三再四的要求，才将他们送回了山东老家。后来，他们在农村人民公社里就成为“反革命家属”，各方面都受到限制，孩子初中没读完就不叫念了，年龄仅仅13岁便被勒令参加农业劳动，全家老少受尽了歧视，哭诉无门。

我到秦城以后，换了黑色囚衣，并被冠以代号“6820”（大概我是1968年第二十个关进来的“犯人”），成了秦城监狱单独幽禁的“要犯”。最让我难以应付的并不是审讯，而是看不到边望不到沿的孤寂，自把我投进秦城以后就再也无人过问了。终日坐在牢里无所事事，连一张报纸也不给，甚至我带去的还是林彪赠送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个横排合订本）都给没收了。我每天只能喃喃自语，或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一、二、三、四……以此来打发漫漫无际的时光，真是度日如年——不，度时、度分、度秒都如年。在监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只要能和人联系、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而单身牢房可不是人呆的地方；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恼，但又没办法不想，难受死了。我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有与人对话的机会。实在难以应付这空寂的时光，无奈，我除了数暖气罩上的孔以外，再就是反复背诵从前熟悉的毛泽东诗词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与填词。这种折磨死人的境况一直到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改善。从此开始，监狱开始发给一份《人民日报》、一本《红旗》杂志，又把入监时没收的《毛选》发还给了我，这样我就有报纸、杂志可看，有书可读了。我除了“一张报纸看一天”外，就是翻来覆去地读《毛选》，几年下来，《毛选》从头到尾我读了三十多遍，有的文章，如《论持久战》甚至读了一百遍以上。刚出监狱时，毛泽东二百字以上的语录，只要是《毛选》上的，我大概用一刻钟的时间可以找到——现在老了，不行了。

在七年多的监狱里，提审没几次。我说，“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这大概是没有蹲过“单身牢房”的人不可能体会到的。在监狱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袭”，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也是这样。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监狱，突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念了两遍。我没想到，终于有出狱的日子了；对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虽然专案组要我马上离开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动改造，而且摆在我面前的仍将是艰难的环境，可是我格外振奋、激动，因为我又见天日了，可以跨出这牢笼了，可以看到浩大的太阳、浩大的天了。经过长达七年半的监禁生活，现在我为渴望回到社会、回到民间。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比独自幽禁在铁窗里强上百倍。

我走出幽禁七年多的监狱，才知道我儿子已经长大了。如果我在北京有家的话，出狱后本来可以允许我在北京住一个星期。可我的家仍在山东，所以我提出要取当年存放在《红旗》杂志宿舍里的衣物和书籍时，专案组的人告诉我：“东西都让你的儿子取走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听说儿子已是中学生，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滋味——我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年前……

#### ◇ 洞庭阳光，温暖人心

我要去的是位于湖南省常德的国营西洞庭农场。到农场后，不看天，不看地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家写信。八年了，音讯皆无。父母想我，我想父母，还有妻子儿子想我，我……想着想着，潸然泪下，恨不能插翅飞到山东老家，立马见到父母、妻子和儿子。信发出，盼啊，盼到第十天，接到儿子写来的信——这是一个中学生写来的信，我真高兴极了。接着父母、妻

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全家人团聚了，老少三代，这是八年来第一次，这是八年来没有过的事情。父母、妻子和儿子看到我还活着——活着，这是他们八年来多么急切地想知道而又没有人能告诉他们的事情。后来父母依依不舍地回了山东老家，我和妻子、儿子则在农场安了家。

经过了解，我知道了西洞庭农场的概况。它是1955年在洞庭湖边上招工建立起来的一个大型农场。农场总面积一百多平方公里，折合十六万多市亩，耕地面积八万多亩，水面五万多亩，干部、职工，包括家属，有三万多人，有十多个分场和一个农科所，每个分场和农科所都有包括小学、初中的学校，总场还有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种植作物，主要是稻、棉、甘蔗。还有糖厂、纸厂、医院、商店。驻场单位有税务所、银行办事处、粮店、邮电支局等。农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小社会。西洞庭农场是湖南省和全国农垦系统的红旗农场之一，由于农场领导改变“坐大船划懒桨”的传统做法，提倡和推行责任制，从1970年代起就年年盈利，这在当时的国营农场中还是不多见的。在农场，我不仅有了温暖的家，这个农场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大企业，觉得很开眼界。我，还有我们全家，在农场，受到领导和职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农场领导把我的家安排在农科所，由于我是北方人，让我到棉花班劳动，不让我到稻田班劳动；还给我订了一份报纸，每个星期让我学习一天；生活上需要什么，农场都给购买，我的被褥、蚊帐，以及安家用的锅、碗、瓢、勺，基本上都是农场给买的。农场烧柴比较缺，很多职工把自己家的烧柴送给我，连农场党委书记家都让我去他家拿烧柴。吃的菜，很多职工让我到他们的小菜园里去摘，或他们摘了送来。我虽然每天都要下田劳动，很累，很辛苦，灼热的阳光晒脱了身上一层皮，可我还是很高兴，和广大职工有说有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像亲人一样待我，从此不仅彻底告别了秦城监狱中那些横眉冷对的看守，也慢慢淡漠了他们留给我的阴影。当时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由于我的问题还没做结论，党的组织生活没恢复，党员的会议不能参加——我知道这是组织原则，不是农场党委所能解决的。

当年11月，我离开北京前迫切要求的结论终于下来了。当专案组把一份打字文件摆在我面前时，才知道专案组的结论共有两条：（1）妄图用假材料（按：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2）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按：此二人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名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也都是我的老师关锋的朋友，他们三个人合作写文章，署名“撒仁兴”，名噪五六十年代）。这完全是妄加的罪。还有处罚：“留党察看一年。”这样的结论，专案组逼着我签字，我想不通，尤其是当年我把那位演员写给江青的信交呈江青本人阅示，说有缺点、有错误，因而影响了她的身体，怎么处罚都可以，但说是“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我当然不肯在这种不实之词的结论上签字。专案组又把江青抬了出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说你是‘坐探’，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很清楚，他们是想说，我们专案组也没有办法，并且说对你处分也不重嘛——用这“莫须有”的罪名，已经关了我七年半，并还要给“留党察看一年”的处罚，还说“不重”，这是哪家的纪律和法律？……我自知辩解无用，因为江青还在台上，我为了能安排一个工作，获得工作的机会，最后还是在这样的结论上违心地签上了我的名字。

关于江青诬我是“坐探”的事，在这里补叙一下。我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到了两个世纪之交，即2000年前后，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她时，她说：“1967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按：“他们”指我和戚本禹等，“被支走”指杨银禄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回家奔丧的事，这件事戚本禹根本不知道——笔者）……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到坐探阎长贵家，找他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这就是江青诬我为“坐探”的一些话，完全是栽赃陷害，血口喷人！现在人们看

了这些话都会觉得可笑，而江青当时是在大庭广众场合脸不红连眼皮都不眨一下说的，我也因此——确确实实因此，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被关了七年多，你说荒诞不荒诞。然而，“文革”中荒诞的事太多了！江青还说什么她“带着秘书、警卫”到我家，说什么“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等等，等等，通通是信口雌黄，胡乱编造——我被迫离开江青的过程上面已经叙述了，不再赘言。江青关我七年多，而专案组一次也没问过我所谓“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为根本没这回事。江青为了整人，整一个她手下的人，竟出此下策，也足见其人格低劣之一斑。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我在农场的事情上。

在作结论前，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我说，等作了结论，你就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去工作。提到覃正彦同志，我情不自禁地要介绍几句。覃正彦，1928年生，石门县土家族人，中农出身，1949年11月参加工作，任过乡长、石门县公安局局长、石门县委副书记、书记，参加过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文革”中作为石门的头号走资派被批斗、打倒，其罪名有鼓吹“包产到户”、为右派鸣冤叫屈、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五年后恢复工作。1972年1月起任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他在西洞庭农场任职八年多，在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如前所说，西洞庭农场年年盈利，是湖南和全国的红旗农场之一。1980年覃正彦调任桃源县委书记，1983年任常德地区纪委书记，1991年退休。覃正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难得的好干部。而1975年11月我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论：妄图“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关押七年半后还要“留党察看一年”。因此农场党委和覃正彦也没法安排我到宣传部工作了。当时农场党委准备安排我到场部农业科工作，我的邻居是农业科的曾副科长，他跟我说：“农业科你不能去，在农业科工作，不管风里雨里都要往分场跑，你一个书生‘耐不活’。”所谓“耐不活”，湖南土话，“受不了”的意思。我接受了我邻居的这个好心的意见，得到组织允许，到农科所学校教书，我教过初中数学、政治，粉碎“四人帮”后还当了农科所学校的校长。1978年，农场党委和覃正彦还是调我到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在当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我发挥了一定作用，我给农场干部作过几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报告，受到好评；农场党委派我参加地委宣传部召开的理论研讨会，地委宣传部留我参与写研讨会的总结。1978年9月，农场党委又送我到湖南省委党校理论干部班学习。这些都足见农场党委对我的重视，也说明我在农场的表现还可以。我经常说“西洞庭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实在是在我发自肺腑的话。

谈到农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农场党委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的事情。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一办”专案组又给我做过一次结论。在这次结论中，当然去掉了原结论中的第一条即“陷害中央负责同志”那一条，但其余一条仍然没有撤销，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有人居然又给我加上无中生有的一条，说我反对周总理。如此妄加罪名，我断然拒绝在这样的“结论”上签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是我在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结业以后，我几次到北京要求平反，每次所需费用，农场财务部门都按出差给我报销，这不仅是切实的物质上的支持，而且更是莫大精神上的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一办”撤销了，他们管的案子都转到了中组部，中组部又把我的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于1979年9月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我回《红旗》杂志社工作——在给江青做秘书前，我是《红旗》杂志社的干部。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非常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在这时，党委书记覃正彦亲自帮助我解决妻子和儿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即所谓“农转非”，而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农场职工看到这种情况，就问覃正彦，你来农场这么多年了，没安排自己一个亲友，为什么对阎长贵这么热心，覃正彦说：“他太老实了！”总起来一句话，我对农场党委和职工深深感谢，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厚爱。

□ 《中外书摘》 2009年第5期

~~~~~

【文革一页】



## 见证历史沧桑的重庆交电大楼

• 何 蜀 •

重庆市最繁华的中心区解放碑周围，现在已经是高楼林立了，而在文革前，这一带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房高度不得超过解放碑的高度。因此，当年这里所谓的“大楼”，最多也就三四层而已。

那时，解放碑周围的这种“大楼”中，最有名的是交电大楼。

### ◇ 大楼原址本是“福地”

重庆交电大楼是由交电公司与化工公司于1956年建成的，四楼一底共5层，在当年周围那众多的矮小房屋之中，此建筑的确是令人羡慕的大楼。它的底层是水磨石地面，楼上都是木地板，主要经营灯泡、电扇、小苏打、柠檬酸等交电、化工产品，其中一、二楼分别为零售、批发，三楼以上是办公室。

交电大楼所在地，应该算是一片“福地”。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著名的四川美丰银行老板康心如的宅邸，当时门前这条街名为柴家巷（后并入邹容路），因此人称柴家巷康公馆。康心如从清朝末年的反清志士、同盟会员，走上“实业救国”道路，通过艰苦奋斗，诚信待人，成为闻名中外的金融家，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蒋介石提名为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在担任议长期间，他倡议定重庆为陪都，并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不少贡献。当年陪都商界、政界乃至军界都有不少名流来此做客。

1939年“五三、五四”（即5月3日、4日），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实施疲劳大轰炸，市内居民死伤无数，许多房屋、街道变成废墟、瓦砾，惨不忍睹。康公馆对面的国泰大戏院，就被炸坏了房屋，柴家巷、蹇家桥等街道及附近许多房屋都被炸毁。为了让后人不忘5月4日的那次大轰炸，在废墟处新修的街道就取名为“五四路”（现在不少人以为这路名是纪念“五四”青年节，大谬）。在这次大轰炸中，柴家巷康公馆居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公馆院内没有掉一颗炸弹，只在公馆旁边康家的防空洞外掉了一颗炸弹。因康家的防空洞比较牢固，洞内条件也比较好，当时附近的电影戏剧界人士常来康家防空洞躲避空袭。

### ◇ 大楼成为武斗废墟

然而，就是这样一片在当年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中都未受到损失的“福地”，却在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时期惨遭战火劫难。

1967年7月，重庆的文革群众组织“八一五”和“反到底”两大派已经展开大规模武斗即“全面内战”。“反到底”派为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军工“井冈山”、重庆无线电厂的人员为主，在解放碑附近交电大楼设立了一个广播站，取名“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这个名字，取自当时流传甚广的一段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是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拼命。有些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将此谱成了歌曲。清华大学与“井冈山兵团”对立的“四

一四”一派，甚至将这首歌当做了自己的“战歌”。

据亲历者回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还有一首自己的专用歌曲，歌词是：

完蛋就完蛋！  
反到底战士钢铁汉，  
心最红，志最坚，  
打不垮，压不弯！  
打不垮压不弯压不弯！  
热血满山城，日月换新天！  
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  
为红十条而战，完蛋就完蛋！  
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  
为红十条而战，完蛋就完蛋！

当时，“反到底”派因在二三月间的“镇反”中受过打击、压制，在宣传中常以“受害者”姿态出现，很能博得一般老百姓的同情。这个广播站，以其名称的特别，也以其广播内容的强烈煽动性，每天都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聆听。它自然被“八一五”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67年7月下旬，两大派开始动用枪支进行真枪实弹的武斗，战火迅速燃遍城内及郊区各地。

8月中旬初，就发生了“八一五”派攻打交电大楼的一场大战。

“八一五”派为什么要攻打交电大楼？除了要拔掉“反到底”派设在市中心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这个“钉子”，打掉其舆论喉舌外，还因为在一周前，发生了一件重庆大武斗中最为莫名其妙的流血惨案。

8月4日，原设于中华路财贸工人俱乐部的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总部搬家。搬家是为了防备遭到武斗袭击，因财贸俱乐部房屋矮小，无险可守，该组织决定搬到临江门外贸大楼。那里对面就是“八一五”派学生控制的二十九中学，周围还有“八一五”派控制的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曲艺团、东方红电影院等。为了防止在搬家时遭到袭击，财贸“八一五”总部负责人王绍川还特别提出要趁午饭时迅速行动，一下子搬完。

然而，事情往往发生在意料之外。第一趟车把东西搬到外贸大楼后，有人认为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再次返回去搬第二次，又叫上了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学生去帮忙。

惨剧就在瞬间发生了。正当二十九中的学生们嘻嘻哈哈地（有人嘴里还吮着冰糕）在财贸俱乐部门前帮着往车上装运东西时，一支“反到底”派的武斗队突然奔袭而来，乱枪齐发……当场打死二十九中学生6人，其中年龄最小者是个14岁的初中一年级女生。

当年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成员，改革开放年代成为重庆市电视台著名编剧的张鲁，后来在《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一文中回忆了他亲眼看到的那次血案的惨状。他在事件发生前，刚从学校的“造反大楼”出来，要回家去吃中饭，正看到一伙同学自己开着解放牌大卡车去帮财贸“八一五”搬家。他回家走的路线正要经过财贸俱乐部。当他还未走到那里时，惨案的枪声已经响起。他随震惊的路人跑过去：

只见财贸工人俱乐部门口街边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着，车厢后板打开着，正搬了一半的文件柜歪斜倒地，车厢上下，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横七竖八俯着仰着。……驾驶室一侧的门开着，驾驶员双腿还卡在车内，上身却倒吊着仰在车外，后颈窝正好枕在上车的踏板上。男孩子18岁刚刚开始发育的喉包因此显得格外突出，颈子上，比一分钱硬币还小的一个洞，像今天的娃娃们吹泡泡糖一般吹出泡泡来，是血泡，吹到极大，就爆了，紧接着又吹下一个。倒挂着的脸上，那双本来就又圆又大的眼睛因为倒挂显得更圆更大，极圆极大……

事前没有任何冲突起因，没有任何摩擦或争执，“反到底”派武斗队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袭击？为什么要对那些手无寸铁的中学生大开杀戒？此事后来连“反到底”派的一些负责人也说不清楚，弄不明白。

这一事件使重庆市民大为震惊，事件发生当天，人心惶惶中，位于解放碑旁边的重庆市三八百货商店（当时为全国十大百货商店之一，即今重庆百货大楼）停止营业。市中区除个别营业点坚持半天或一两小时营业外，各大小商店大部分都停止营业……

这一事件，也激起了“八一五”派的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对“反到底”派的深仇大恨，成为一周后“八一五”派攻打交电大楼“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的重要原因。因为那支突袭财贸俱乐部的“反到底”派武斗队，就是从“完蛋就完蛋”广播站里出来的。

于是，8月11至13日，以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为主力的“八一五”派武斗人员，猛攻设于交电大楼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八一五”派从马路对面的东方红电影院（文革前的和平电影院，抗战时期著名的国泰大戏院）与交电大楼的“反到底”派交火。“反到底”派是从军工厂成品库房取出的全新半自动步枪，武器好，火力强，但势单力薄，陷于孤立状态；“八一五”派武器虽差一些，但人多势众，几面包围，因此双方打得一时难分难解。

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地区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枪战，实属“史无前例”。

激战至13日晨6时，交电大楼三层楼内起火——起火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八一五”派用反坦克火箭筒发射燃烧弹引起大火，有人说是“八一五”派射去的信号弹起火，有人说是“八一五”派用土制燃烧瓶（玻璃罐头瓶中装有易燃易爆物品）扔进楼内起火，还有人说是“反到底”派为给“八一五”派栽赃而自己放的火（为此“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的负责人被关押审查多年）……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大楼内燃起了大火，又正值重庆酷热的“秋老虎”逞威时节，大楼内的木地板及其他易燃物迅速燃成一片火海，烧至紧邻的化工原料公司、针纺公司等处，整幢大楼被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

据知情者回忆，在那次武斗中，“反到底”派财贸“井冈山”总部的一个负责人（那时叫“勤务员”）、重庆市第一商业局的共青团干部，见交电大楼顶上“反到底”的“战旗”被枪打倒了，奋不顾身跑到楼顶上去重树大旗，腹部中弹，肠子都打出来了，不过他被抢救过来了，至今健在。“反到底”派的一批增援人员从中华路绕过来，在实验剧场外面与从区交通局出来的“八一五”派人员遭遇，“反到底”派被打死了两三个人。而东方红电影院这边，“八一五”派二机厂的一个工人（开车技术很好，他教会了二十九中不少学生开车）胸部中弹身亡。

另有知情者回忆，“八一五”派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当时预料“反到底”派武斗人员会从交电大楼后面往青年路方向撤退，事先在学校围墙栏杆处布置好了封锁道路的机枪火力点，几挺机枪对准必经通路，红了眼的中学生们一心要为财贸俱乐部门前的死难同学报仇雪恨。但守候到13日晨，天都亮了，却一直未见到“反到底”派撤出来；“八一五”派学生们疲

急不堪，便收起机枪回重庆宾馆驻地去了。谁知就在他们走后不到半小时，交电大楼内的“反到底”派人员就从那条路撤离了——若“八一五”派晚走半小时，或“反到底”派早撤半小时，很可能又是一场死伤惨重的血案。

重庆市中心繁华地带着名的交电大楼，就此化为一片废墟。一位从四川忠县来重庆探亲被阻于武斗无法回家的干部陈懋智，在当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看到的情景：

下午同隔壁老六步行进城。……临江门城外一些房屋毁于炮火中，解放碑交电公司一片瓦砾，不少残墙独柱欲坠欲倾，昔日富丽建筑而今已成废墙。解放碑一带商店几无一家开门。行人不多，只是大字报贴得举目皆是。

当年重庆市国庆节游行时，从解放碑观礼台上拍摄的照片中，即可见游行队伍左侧与红旗交相辉映的交电大楼黑色废墟。

大动乱中的各种“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联合、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一打三反”……因为忙于应付各种“运动”，重庆的当权者无暇顾及处理交电大楼废墟有碍观瞻的问题。这座武斗废墟，竟在重庆市中心繁华地带“屹立”了将近3年。直到1970年5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公会议才通过决议，重建五金、交电大楼。

#### ◇ “民办十大宣传队”占据大楼

新的交电大楼建成营业后不久，文革又掀起了新的动乱高潮。

在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后，重庆有少数人员，有的是原造反派组织中的成员，有的是一些单位因各种原因受过打击、压制或自感不得志的人员，受到“十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号召“反潮流”的指示鼓舞，同时也受到上海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鼓舞，自行组织了一个类似于文革前期造反派组织那样的“十大宣传队”，借宣传“反潮流”精神为名，想要再一次发动群众性的造反运动。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强占了市中心交电大楼上面的房间，从对面的和平公寓抢来了被盖，摆出一副要“长期抗战”的样子，并在交电大楼上架起广播喇叭，大声疾呼，鼓动市民起来“反潮流”。

当时在交电大楼前围观者众多，但响应者寥寥，因为毕竟形势不同了，经过几年的动乱折腾，人心思定，谁还愿再去“受骗上当”？更何况，“十大宣传队”还举起左手打倒“走资派”，举起右手打倒造反派两大派进入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这就使“十大宣传队”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原造反派两大派进入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们也对其所作所为十分反感。

1973年12月2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中南海接见包括重庆四九七厂、四五一厂和大足汽车厂代表在内的四川重点企业赴京汇报会全体代表。中央领导人在接见时指出，重庆有人搞“民办十大宣传队”，还宣传“四川特别是重庆，从上而下是宗派主义统治”，这是完全违背十大精神的。另据记载，1974年3月10日，周恩来总理就重庆市“民办十大宣传队”作出指示：如果群众已经公愤，能夺回他们抢去的武器，救了他们抓走的民兵，他们在群众中已经孤立，正是做工作的好机会。（见《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123、124页）

于是，1974年3月12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对“民办十大宣传队”的处理意见，指出：该“宣传队”不宣传“十大”精神，不批林批孔，脱离党的领导和生

产工作岗位，应自动解散。各级党委及本单位负责人要多做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其成员返回本单位。随即，市委、市革委就出动民兵，由省革委常委、原“八一五”派负责人陈万明指挥，把“十大宣传队”的活动据点查封了。

#### ◇ 大楼前贴出白智清大字报

交电大楼恢复平静没有多久，新的动乱高潮又掀起了。

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这个运动更是进入了高潮。然而，与“翻案不得人心”相反，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运动不得人心”，许多人对这场运动都是冷眼旁观，甚至冷嘲热讽。交电大楼临街的外墙上，又成了各种人物张贴大字报和传单的一个好地方。

1976年2月18日，在交电大楼临街墙上张贴出了一篇赞扬邓小平功绩、锋芒直指“四人帮”的大字报《我爱我的祖国》，作者是重庆钢铁公司的青年技术员白智清。他在大字报中历数那些“丧尽天良的牲畜们”弄得这几年“多少个烟囱停止冒烟，多少部机器停止运转，多少辆火车停止运行，钢产量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上升”，热情颂扬邓小平主持工作的1975年“钢产量是近十年来净增最多、上升最快的一年，是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全面恢复的一年”。他尖锐提出：“是谁，到底是谁，葬送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人民的幸福，并且连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也不放过？”他大声疾呼：“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大字报末尾，他毫无畏惧地写上了真实身份和姓名：重钢职工白智清。当年，笔者周末从郊区工厂回到城里，也跑去看了那张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它贴在交电大楼临邹容路一面的大橱窗下靠墙根处，长长一排。

后来，白智清又到成都闹市区贴出了点名抨击张春桥的大字报，引发了观看大字报的不同观点人群争论、冲突的“三五事件”。白智清于是成了被公安部全国通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被逮捕后押回重庆，1976年5月8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他遭到批斗、游街，关押至文革结束后才平反出狱。

数十年弹指过去。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早已显得过时的交电大楼终于拆迁，在这片黄金宝地上建起了高出原“大楼”数倍的重庆商社和新世纪百货大楼。如今进出这幢名副其实的大楼采购货物的市民们，还有谁记得当年的战火与喧嚣？

□ 《文史精华》 2009年第4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